

坚决打好深度贫困区脱贫攻坚战

代表热议深度贫困区脱贫之策

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记者字强、吴文诩、王博)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是打好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当前，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关键阶段。于非常之时，必以非常之举，尽非常之功。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大精准脱贫力度”“强化对深度贫困地区支持”。来自四川凉山、云南昭通、甘肃陇南地区的三位全国人大代表，面对打赢脱贫攻坚战，诉说着他们切实的体会和思考。

教育扶贫：为大小凉山播种希望

“现在村里建了汉、彝双语幼教点，读了书就是不一样，娃娃们会讲普通话了，还变得有礼貌。”在全国人代会分组审议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庆恒乡庆恒村党支部书记吉克石马高兴地和其他代表们分享了这件开心事。

地处四川西南部的凉山彝族自治州，是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区域性、整体性贫困问题突出，全州17个县中有11个是深度贫困县。为了让民族地区儿童过好“国家通用语言关”，从小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从2015年起，四川在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启动实施“一村一幼”计划，推动教育精准扶贫。吉克石马提到的幼教点，如今在四川凉山州已多达3000余个。

贵州：『校农结合』成扶贫新模式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王丽、肖艳)三月的贵州，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民忙碌的身影。撒菜种、铺地膜……在贵州省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新关村，村民黄恩泽正在自家地里忙活着。

“种菜的两亩地，去年一季豇豆卖了11000多块钱，一季苕笋卖了上万元，再加一季土豆的收成，毛收入有将近三万块钱。”他乐呵呵地算着种菜的收入，可是以前种粮的七、八倍。

新关村是贵州省一类贫困村，耕地稀少，石漠化严重，耕地产出低。村支书刘兴雄说，现在这里成了蔬菜专业村，毛南族群众脱贫发展，得益于贵州“校农结合”扶贫新模式。农民种的菜，定点卖给对口帮扶的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校不仅签订协议组织收购，还派出专家指导生产，在村里建了示范点、检验室、冷藏库，培育脱贫产业。

卡蒲毛南族乡乡长石通伯说，“校农结合”扶贫，让卡蒲乡一年间生猪存栏增长2.2倍，土鸡增长2倍，萝卜增长5.1倍，土豆增长3.9倍，白菜增长2.9倍，一批生猪村、白菜组、茄子寨悄然形成。

学校食堂是稳定的消费市场，将学校的农产品需求导向与农村产业调整精准对接结合，“校农结合”成为贵州省推动产业脱贫、乡村振兴和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创新举措。

据统计，贵州目前有各级各类学校食堂1.7万个，每天就餐学生500多万人，每月消费农产品金额超过10亿元。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说，通过这一稳定而庞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可以引导贫困地区贫困户发展产业，吸引进城务工农民返乡就业，助推乡村振兴。

2017年秋季学期以来，贵州省学校食堂累计采购贫困地区贫困户生产常用农产品5.97万吨，采购金额约6.5亿元。经过各地各校探索，形成黔西南州“贫困户+合作社+配送中心+学校”、西秀区“绿野芳田农户+合作社+购销平台+学校”、贵州民族大学“菜园子直通菜篮子”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定点采购、产业帮扶、基地建设、示范引领”等工作模式。

贵州省教育厅日前出台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校农结合”助推脱贫攻坚的意见，提出继续探索集团化推进“校农结合”扶贫模式，2018年确保全省学校食堂向贫困地区贫困户采购农产品占采购总量的40%以上，同时严把食品安全关，确保学校后勤及校园安全稳定。

邹联克说，“校农结合”是产销有机对接的创新，也是计划生产、便捷流通、订单购销的协调统筹。贵州省将充分发挥学校优势，在推进“校农结合”中做到三个结合：一是需求引导与产业培植结合，按照“学校需要什么就组织生产什么”指导产业结构调整布局；二是建基地与搭平台结合，遵循市场规律确保校农双赢；三是扶贫与扶智结合，发挥教育部门智力资源优势，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

扶贫离不开“扶志”和“扶智”，教育至关重要。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州长苏嘎尔布说，四川在民族地区推行从幼儿园到高中全覆盖的15年免费教育，就是希望从孩子抓起，斩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源。

“许多家长的愿望就是孩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也是拔掉贫困地区‘穷根’的治本之策。过去，学前教育缺失导致民族地区儿童产生语言障碍，学习困难，‘一村一幼’计划正是解决了老百姓的这种迫切需求。”苏嘎尔布说。

吉克石马说，“一村一幼”让彝族聚居区孩子在同一起跑线上共同奔跑，为凉山发展播种了希望。

开在山沟沟里的网店发挥扶贫能量

甘肃陇南，山大沟深，自然资源却十分丰富，然而，多少年来，由于交通落后，当地百姓只能守着这些“宝贝”过着苦日子。

2013年底，陇南市委提出在电子商务上集中突破，让互联网为脱贫发挥效用。身在广东打工的“80后”姑娘梁倩娟知道这个消息后，毅然辞职回家，投入到电商创业。

几个月后，梁倩娟的网店给村里带来不小的震动：仅仅靠着一根网线，轻敲几下键盘，就

把地里种的庄稼、树上结的核桃、山里长的野菜变成了钱，生意越做越红火……

“我妈妈做的油泼辣子还卖到了墨西哥哩！”梁倩娟自豪地说，网店的销量不断扩大，家乡的许多特产成了网上的抢手货。如今，梁倩娟的线上销售收入累计达到450多万元。

被电商“激活”的不只是销售农产品的普通农户，村里30多个贫困户也被带动起来。他们长期给网店供货，找到了脱贫的门路。据梁倩娟介绍，仅她一家网店就带动了村里及周边300多户农户增收，其中包括128户贫困户。

2018年，从陇南走出的电商梁倩娟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她说，万万没想到，自己实现了创业梦，也帮助更多的家乡亲人实现了脱贫梦。“把空间上的万水千山，变为网络上的近在咫尺。”梁倩娟希望国家加大农村电商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让农村电商能够更加成熟，发挥更强的脱贫带动力。

用一张“路网”开拓一条脱贫之路

在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中，云南省昭通市是贫困人口最多的地级市。7个深度贫困县，占云南全省深度贫困县的近四分之一。

脱贫攻坚任务之重，非同一般，昭通市在

寻求适合自己的发展出路。

“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是影响昭通发展最大的瓶颈。”全国人大代表、昭通市市长郭大进告诉记者，“交通先行战略”，成为昭通市最重要的扶贫战略之一。

在贫困地区修建高速公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统筹规划，精心设计。昭通市请来国内外一流的团队开展地方高速公路技术指标课题研究，昭通从此成为全国首个编制实施高速公路建设地方性标准的州市。

目前，一条全长115.648公里的宜毕高速公路正在如火如荼地兴建中。“该条高速公路因地制宜、科学规划，既达到了保障通行能力、减少土地征用的目的，又最大限度地保护路域生态环境、降低建设成本。”郭大进自豪地说，昭通其他9条在建高速公路上同样采用该标准，节约了约20亿元建设成本。

要致富先修路，交通运输发展畅通了昭通市的发展血脉。

“目前，昭通大山包地区正在新建一条55.32公里的一级公路，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加快了沿线贫困乡镇脱贫出列的步伐，昭通大山包旅游景区也因此走向世界，还举办了国际翼装飞行大赛。”郭大进说，“到2020年，12条高速公路将全部建成，昭通高速公路总里程将达近1000公里。”

西安：扶贫超市，一“市”多赢



▲这是扶贫超市销售的周至县南寨子村生产的手工鞋(3月13日摄)。新华社记者邵瑞摄

都是与贫困户现金当场结清。

“考虑到贫困户的需求，我们的收购价会高于市场一些，但按照规划，西安的扶贫超市主要设置在景区和游客密集的区域，这部分溢价很轻松就能消化掉。”负责创办、经营这家超市的西安曲江楼观旅游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宫世峰说，“店里有大小类别的产品50多种，别看只是附近村镇贫困户家里的土特产、农副产品、手工艺品，但这些原生态的山货，经过专业团队的设计包装，卖相提了上去，游客很喜欢。今年春节前才开的店，现在已经挣了5万多元。”

此外，宫世峰表示，扶贫超市虽小，却能在贫困户和市场之间搭起有效的桥梁。“周至县大片村庄隶属秦岭山区，这些贫困户种的是有机无公害的农产品，做的是传统工艺的小物件。但过去农民有产品，市场有需求，双方却对接不到一起。现在有了扶贫超市，双方

信息能互通，各取所需，效果很好。”

他举例店里的手工布鞋，特别是给孩子穿的虎头鞋、猫头鞋、猪头鞋都卖得很好。“一双鞋45元，一个贫困户老太太一天就能缝出两双，现在已经成了几个村贫困户的支柱产业。”

西安市还计划将扶贫超市作为倒推农村“三变改革”的抓手。什么产品在扶贫超市里卖得好，就组织当地成立相关产业的合作社，有的放矢，让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不愁销路，让“三变改革”落到实处。

在扶贫超市里，记者看到，每一件产品，都详实地写出生产该产品的贫困户的姓名、情况，还颇为创新地标注出该贫困户需要销售多少产品就能实现脱贫。一位在店里购物的游客表示，在这里买东西的体验就像是众筹献爱心，能让自己觉得也为国家的扶贫事业出了一份力。

兰州：技能扶贫，授贫困户以“渔”

的面积都是农村，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在七里河区，像王坤宏这样，因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力转移就业能力不足而无法脱贫的人占多数。很多贫困户家庭因为缺技术、缺经验，打工的机会和收入也与非贫困户有很大差距。

近年来，兰州七里河区把强化技能培训作为开展精准扶贫的关键措施之一，按照“一乡一品”的思路，对有劳动能力和培训需求的贫困户分类进行订单式劳务培训，让贫困户“零成本”学技术。

2016年，王坤宏参加了七里河区政府组织的免费汽车驾驶培训课程，拿到了驾照。2017年，他又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电焊培训，获得了“焊工证”。这两项技能让王坤宏的年收入第一次超过两万元。收获了“技能红利”，王坤宏鼓励妻子也参加了家政服务培

训，培训后他的妻子很快就在一家宾馆找了一份保洁员的工作，每月工资有2000块钱。

“参加培训后，不仅活好找了，收入高了，最重要的是能被人瞧得起。”王坤宏告诉记者，打零工时常被人看轻，没少受冤枉气。“按照这个势头，今年我们家就能脱贫了。”王坤宏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他打算下半年报名参加出租车上岗培训，“出租车司机的工作比较稳定，收入也高，还能更方便地照顾家里。”

精准扶贫，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能培训使越来越多的贫困户凭借技能证书闯出脱贫新路。据七里河区就业服务局介绍，近3年全区共组织了各类劳动力培训26000多人，先后培育打造了“阿干镇厨师”“黄峪镇农机”“魏岭乡家政”“西果园镇巧手百合”等特色劳务品牌，为831位取得国家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的贫困户，发放补贴共计93.19万元。

身材瘦削，动作麻利，说话干脆，健步如飞……初次见到全国人大代表刘入源，很容易被他积极、干练的“精气神”吸引。“我性子急，做事喜欢走在前面。”他笑笑，伸出左手来握手，这才让人注意到他的另一只袖口是空的。

“这几天跟大家谈乡村振兴、产业扶贫，我学到了很多東西，想着回去赶紧把新的养羊基地和深加工厂房做起来。前两天我就打电话给乡亲们，让他们先帮土地给整平了。”这几天一有空，他就琢磨如何壮大养羊产业，帮助更多人摆脱贫困。

今年35岁的刘入源在1999年因一场意外失去了整个右手掌。但他从没有因此沮丧，用一只手开创出了一番养羊事业，并带动长江村和周边村镇300多户贫困户养羊，每年户均增收2万元以上。2016年、2017年他分别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民”“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中专毕业后，刘入源在镇上打工过，卖过茶叶，2009年回到村里创业，引进了31头山羊，因缺乏防疫知识技术，这些羊很快全死了。他不甘心，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请教专家，买了相关书籍学习养殖知识，又借钱买了31头山羊。

“为了把羊养好，我把椅子搬到羊圈里，观察羊进食、排便的过程，了解它们的习性。”现在，乡亲们发现自家羊的状态不对，就会拍一段视频用微信发给刘入源，他看一眼就知道得了什么病，再把相应的药品名称、用法用量发回去。

2012年，刘入源养的羊存栏量达到200多头，办的养殖场初具规模，生活得到了改善，他开始动员乡亲一起养羊。刘入源说，他喜欢帮助别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帮助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随后几年，他成立了养羊协会和自己的公司，以“公司+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在周边多个村发展起养羊产业。现在，他自己养羊1800多头，其他农户养羊5000多头。

在刘入源看来，产业扶贫不能把产业“硬塞”给农民，而应该注重引导农民的创业意识，变被动为主动。“我从村民那里收牧草，经常给出比市场价高不少的价钱。家里人都说我笨，给那么高价格。但我想让大家明白只有通过自己的劳动才能有收获，慢慢培养他们的信心和习惯。”刘入源说。

刘入源说，最对不起的是家人，“我的羊圈是铁皮瓦的，我自己家的屋子下雨天还会漏水，羊都比我住得好。”可是，建新房并不在他今年的计划中。

“今年要在比较远的一个村再建一个养羊基地，那里太穷了。”两会期间与一些企业家的交流也让他受到启发，他决定做产业的深加工，继续拓展产业规模。(记者吴嘉林、卢婵婷)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完善保障机制 严防贫困上门

代表关注贫困线边缘群体

新华社北京3月16日电(记者郑明达、王大千)“在调研中我们发现了一批未纳入建档立卡范围，但在‘两不愁、三保障’方面确实存在困难的贫困线边缘群体。”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州长白加扎西说，贫困线边缘群体家庭经济收入不稳定，容易因大病或意外伤害致贫，当前应加快精准识别，给予一定的政策帮扶。

白加扎西说，调查显示，2017年青海省共有边缘贫困户近7万户，占全省农村户籍总人口(不含西宁四区)的7.74%，他们绝大多数与建档立卡贫困户一样，在家庭经济收入、教育、住房等方面存在一定困难。

“在部分农区，村庄道路窄、田间道路少、水利设施落后，制约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生产经营；在牧区，虽然政策性收入较为稳定，但有部分贫困线边缘户从事传统畜牧业，生产资料匮乏，有的依靠季节性采挖虫草增收，但受市场影响，收入波动较大。”白加扎西说。

“贫困线边缘户人均人口相对较高，日常生活开支占比较高，不享受扶贫政策的保障与兜底，在大病救治、接受中高等教育、婚丧等方面的支出负担较重。”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门源回族自治县教育局教研室副主任孔庆菊说。

白加扎西建议，探索贫困线边缘群体的生活保障机制，对在“两不愁、三保障”方面确实存在一定困难、符合建档立卡要求的农牧户，要尽快按照精准识别程序纳入政策保障范围。对不符合要求的，要通过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带动家庭增收，改善经济状况。

孔庆菊建议，针对贫困线边缘群体，应提高其对兜底保障政策的认知程度，从医保参保、教育保障等方面进行政策倾斜，增强抗风险能力，减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等现象。

引导创业意识，让农民主动脱贫

刘入源代表的产业扶贫经